

少子老龄化困局： 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剖析与破局策略

何怡然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000; 2770743698@qq.com)

摘要: 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等结构性挑战。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剖析发现, 资本逻辑下劳动力商品化, 加剧生育成本社会化与家庭化的矛盾, 致使生育意愿降低;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失衡在生命周期的体现, 带来劳动时间配置矛盾和代际剥削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应通过重构社会化抚养体系、完善劳动力价值补偿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这一探索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注入时代内涵, 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生育率; 老龄化; 劳动力再生产

引言

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 人口结构正经历着深刻变革, 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特征愈发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降至902万, 总和生育率跌破1.0警戒线,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9%, 这些数据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 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变量, 其结构转型带来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少子化导致未来劳动力储备减少, 影响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后劲; 老龄化加速使社会保障体系承压, 对养老金、医疗保障等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则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这些问题相互交织, 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马克思指出: “事实上,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1]。”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新时代背景下,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剖析中国人口问题, 探索符合国情的解决方案, 不仅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时代需求, 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核心要义

从人口结构来看, 中国式现代化正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等挑战[2]。面对这一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命题, 新马尔萨斯主义陷入资源承载力与人口增长的机械二元论, 将复杂的社会过程简化为线性方程; 新自由主义则将人口波动包装成价格信号引导下的均衡模型。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揭示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这对矛盾运动的辩证统一关系。

1.1. 历史唯物主义: 人口问题的分析锚点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有着极为重大的贡献, 它不再仅仅从自然规律的角度去阐释人口问题, 而是把人口问题置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加以审视。这说明关于人口的特征和行为模式需要回到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寻求解释, 而这些人口因素又会进一步影响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和社会结构[3]。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 人口数量的增减、年龄结构的变动以及人口的迁移流动, 实际上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把人口问题放在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坐标体系中加以考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蕃衍[4]。”“两种生产”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物质生产与人口

再生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两种生产”进一步界定：“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5]。”这一论断揭示了人口发展的双重属性，并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对农奴制改革后的人口流动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出人口结构变迁背后所蕴含的生产关系变革。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将人口置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之中，揭示出其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本质特性。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构建起理解人口现象的历史辩证法框架，它挖掘出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之间的深层次联系，掌握了人口变迁的深层逻辑。

1.2. 资本逻辑：人口运动的支配力量

马克思的理论工具需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实践的双重语境中检验。在人口发展领域，既要承认资本逻辑的局部存在，更要强调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党的领导、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制度超越。这种辩证思维，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核心方法论。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对人口发展模式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市场机制在潜移默化间，既推动少子化趋势不断加速，又加剧了老龄化进程，悄然改变着人口结构的演变轨迹，还致使劳动力持续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

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症结在于，企业为提升生产效率，不得不加大对技术设备的投入，然而这一举措会降低对工人的依赖程度，可工人的劳动却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为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6]。”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相对过剩人口现象，绝非偶然出现的“市场失灵”，而是资本有意构建的产业后备军。由于资本更多地投入到设备技术的更新迭代上，减少人力使用的出发点致使劳动力过剩，大量超出企业实际需求的工人失业成为资本运动的必然结局[7]。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使得大规模失业人口的存在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正以愈发危险的方式逐渐暴露。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广泛的智能应用不断压缩劳动力的应用空间，技术进步与人口下降同步发生。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在中国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例如，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资本逐利、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需要警惕资本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劳动者可能面临劳动异化问题，马克思的理论为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劳动者权益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在应用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科学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关注中国社会中的资本运行、社会分层、劳动权益等现实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

1.3. 社会再生产：人口理论的范式革命

马克思主义透过人口现象，深刻洞察到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生命周期进行了系统性的重塑。马克思主义揭示出，社会制度才是人口变化的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人的劳动被异化为商品，进而产生了双重剥削：工人不仅要出卖自身劳动以维持生计，还需独自承担培养下一代劳动力的全部成本。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记载19世纪英国纺织工人因贫困而被迫推迟结婚生子的现象，这一典型事例清晰展现了资本主义是如何扭曲人口再生产规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明了人口作为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的本质属性，强调人口现象并非单纯由自然规律主导，而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社会再生产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拓展，揭示了妇女在家庭中的生育劳动遭受隐蔽剥削的现实状况。家庭结构的演变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私有制出现后，为了让女性承担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所设计的制度性安排。马克思主义认为，诸如培养孩子、照顾病人、赡养老人这类维持人类生存的活动，本质上属于社会公共活动范畴，理应获得社会的认可与保障。然而，资本主义却将这些必要劳动转化为家庭私事，使得普通人在市场压力下举步维艰，陷入“越穷越生不起，越生不起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马克思主义分析人口问题的核心方法，为破解当代人口困境提供了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路径指引。这一方法的关键要点在于，依托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洞见、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解构以及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范式革命。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对人口问题的剖析绝非孤立地看待生育率数字，而是深入考察深层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

2. 少子化老龄化的现状剖析

2.1. 人口结构深刻转变的现状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变量，以少子化、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转型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8]。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显著特征，这一论断意味着我国人口发展迈入了全新阶段。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降至902万，总和生育率跌破1.0的警戒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9%[9]，这清晰地表明我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型。具体而言：

其一，少子化态势凸显，当前民众生育意愿普遍且持续走低，生育率持续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我国生育率近年来持续下降，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10]。然而，不同地区的生育率差异显著（见图1）。例如，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的生育率极低，而欠发达地区如贵州、广西的生育率则相对高于经济发达的地区。这种差异反映了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深刻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高昂的生活成本、房价压力以及职业竞争使得年轻夫妇推迟甚至放弃生育；而在欠发达地区，传统生育观念和较低的生活成本则维持了相对较高的生育率。与此同时，婚育年龄不断推迟，人们愈发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以及职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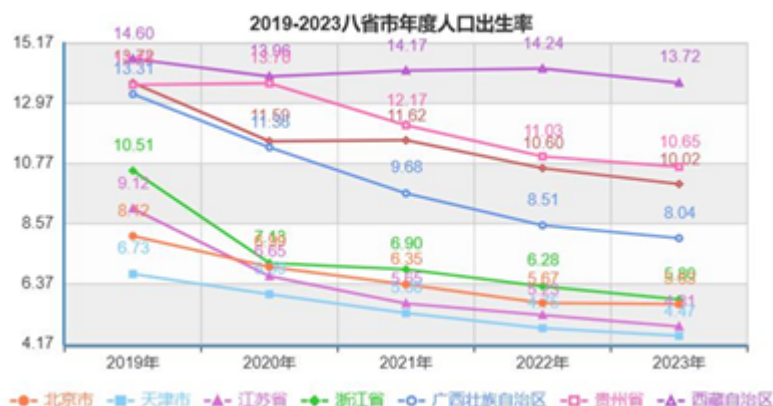


图1 八省市2019-2023人口出生率图谱[11]

其二，超常规速度推进的老龄化进程，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依靠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福利制度维持生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5岁及以上人口达22023万人。超常规速度推进的老龄化进程，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为保障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必须尽快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难题。人口形势所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不仅与社会的长远发展息息相关，更是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的关键节点。这些变革对于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也是达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

2.2. 少子化老龄化协同演化机制剖析

老龄化与少子化是伴随现代化进程出现的问题，实则是当前社会个人权力与公共责任之间失衡的表现。个人权利应该得到保护，社会续存也应该得到保护，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破解的难题[12]。其成因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从以下方面，剖析老龄化与少子化的成因：

其一，生育成本与抚育成本上升。根据马克思的界定，“工资的本质应包含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存、发展及代际更替所需费用”[1]。在资本主导的分配体系之下，工资被简化成了“即时劳动能力”的市场价格。劳动者的收入仅仅勉强能够维持自身的生活，却难以承担养育后代所需的成本。这种经济层面的压力，实则是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的深层根源所在。这就导致生育行为不再是社会财富创造所必需的环节，反而被异化为家庭经济风险的主要源头。马克思揭示的“劳动力商品化”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得到验证：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全国平均养育成本从0岁到17岁约为53.8万元，养育到本科毕业的平均成本则达到68万元。以打工者为例，在支付房租、医疗等基本生活开支之后，他们根本无力在子女教育、住房改

善等方面进行长期投入，如此一来，少生甚至不生育便成为了自然的选择。与此同时，低生育率进一步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当代生育率危机的本质，体现了资源分配权力在代际间的失衡状态。

其二，社会劳动时间配置失衡，随着逐步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显著下降，劳动力供给减少。老龄化社会中，生产性劳动时间与赡养性劳动时间呈现挤压和对抗的态势。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也对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生产性劳动的收入是赡养性劳动的经济基础，但二者在时间资源上又存在竞争关系。赡养性劳动时间可能挤压个人的工作时间和生产性劳动效率。由于家庭照料责任，个体需要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分配有限的时间，这种分配常常导致工作家庭冲突。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传统“大家族”的家庭模式受到市场化冲击，年轻一代更加注重个人发展，在家庭照料时间明显减少。而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使得老年照料的需求明显增加，这一矛盾下个体需承担赡养性劳动的负担增加。工作家庭冲突加剧，又会影响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生育意愿。这样的结构性危机不仅对已婚者的家庭亲密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同样对未婚者建立亲密关系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在后人口红利时代，由于人口规模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的不可逆特征，只有以突破人力资本增量边界为关键手段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才能够彻底破除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所带来的突出矛盾[13]。

其三，传统家庭观念转变，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独生子女家庭作为计划生育的产物，承载着“四二一”结构的制度性风险，这样的倒金字塔抚养结构，以单一劳动力支撑父母养老与子女养育双重成本，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令人忧虑。在市场化 and 城镇化作用的推进下，高额的房价使得“掏空六个钱包”成为子女实现“城市梦”的普遍方式，实际上是家庭通过代际转移支付的方式私人化承担。不同于西方父辈与子辈成年后较为独立的核心家庭文化，受到传统“家天下”观念的影响，我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在子女成年后仍没有断裂[14]。当子女在养育与职业发展中两难时，常向父辈寻求经济和养护帮助，使得隔代养育普遍化，而隔代养育这一现象实际上正是代际转移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这种机制实际上是通过压缩生命周期的完整性，对家庭的再生产能力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2.3. 少子老龄化的三维冲击

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叠加效应正引发深层次系统性危机，其影响远超人口结构变化，通过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形成多维冲击。东亚地区已率先呈现严峻现实。

其一，经济系统失速风险，东亚正经历人口结构塌陷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2025年3月有效求人倍率达到1.26倍[15]，制造业岗位空缺周期持续拉长，劳动力市场呈现显著的“供需断裂”特征。而多数老年人倾向于资产保值而非消费升级，年轻群体因收入增长停滞无力接盘，致使市场流动性陷入低效配置状态，形成“资本冗余与需求萎缩”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经济循环梗阻，严重削弱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其二，社会结构解构危机，传统家庭单元在东亚的加速瓦解催生新型社会风险形态。日本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家庭结构中一人构成的“单身家庭”最多，共计1849.5万户，占到整体的34.0% [16]，社会结构“原子化”趋势显著。个体孤独生存状态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而低生育率又反向加剧社会原子化，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社会关系的离散化，不仅削弱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功能，也增加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复杂性与成本。其三，文化价值断裂挑战。东亚儒家伦理体系在人口结构剧变的冲击下遭遇“降维打击”。以日本“无缘社会”现象为代表，国民社区归属感缺失，社会联结弱化。在婚育观上体现的尤为明显，生育行为被重新定义为“沉没成本过高的人力资本投资”，传统生育文化价值消解，人口再生产机制便失去文化动力。文化价值体系的动摇，动摇了社会凝聚与代际传承的根基。

少子老龄化作为21世纪全球的“文明级挑战”，其严峻性已超越单纯的人口学范畴，演变为重构社会运行逻辑的系统性危机。中国亟需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引，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策略，以缓解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多维冲击。

3.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域下应对少子老龄化的实践路径

3.1. 培育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动能

人口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面对人口总量趋稳与结构变迁的双重挑战，培育新型动能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

第一，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适配性提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当人力资本的结构和类型与产业结构高度匹配时，可以显著提高产业升级的效率。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关键在于解决劳动与岗位的匹配问题，人力资本需要与产业结构同步升级，以确保劳动者素质能够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17]。为提升人力资本与产业升级的适配性，需加强教育与产业的联动，促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通过优化教育体系，特别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在政策设计上，应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打破劳动力流动障碍。同时，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促进人力资本在产业间的合理流动，以提升整体适配度。第二，数字经

济时代新型人口红利培育,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逐步改变传统人口红利的模式,新型人口红利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提升和人口流动迁移上,这些因素通过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具体而言,新型人口红利包括资本型人口红利和配置型人口红利,这些红利形式不仅依托于人口质量改善,还通过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人口在不同区域和行业间的合理流动,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18]。第三,银发经济与老龄社会治理创新。银发经济是当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力量。值得参考的日本,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通过出台《护理保险法》、《老人福祉法》等法律法规,为银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制度支撑。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加强人才培养和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可以有效应对银发经济面临的挑战。

培育人口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本质是通过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重构人口价值实现路径。在产业转型中重塑人力资本优势,在数字革命中创造新型人口红利,在银发经济中开辟第二增长曲线,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可持续动力。

3.2. 重构社会主义人口发展文化生态

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传统的生育观念和家庭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发生变化,面对个人主义膨胀与消费主义侵蚀带来的生育文化异化,亟需以马克思主义人口观为指引,需要积极塑造和培育生育友好的文化氛围,构建人口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共生关系。

其一,重建社会主义生育文化价值体系。构建新型生育文化,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要重塑家庭价值观,大力倡导新型婚恋观,营造社会信任度高的环境,以此通过社会文化层面的重塑来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例如,在文艺创作中着力塑造既重视个人发展,又勇于担当家庭责任的青年形象,进而重建“家国同构”的生育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新型生育文化的构建离不开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建立并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便是关键举措之一,以此充分保障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其二,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的当代传播。在当代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的传播路径丰富且多元。马克思主义人口观强调人口增长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适度人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人口观明确要求人口数量必须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配。通过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人口观,能够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其三,破除消费主义对生育文化的异化影响。消费主义秉持过度物质占有和无限消费的理念,将物质享受置于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严重扭曲了生育文化。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需从社会氛围营造、法律制度完善、信息传导优化以及性别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布局与系统规划。以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为指导,充分吸收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婚育文明当中的有益成分,与新时代主题和社会文明进步相结合,赋予丰富的时代内涵,引导形成文明和谐、尊重婚姻、尊重生育、尊重家庭的新型婚育观[19]。

3.3. 构建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

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的构建,本质是尝试重构人类文明发展的范式,通过制度设计贯通从生育决策到教育资源配置再到代际共生的完整闭环,让每个年龄层都能在不同阶段创造价值、共享成果,以期能为代际对立困局的破解提供一定参考。

一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使育儿投入转化为可跨期支取的养老权益。当前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折射出“生不起、养不起”的现实困境。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需要从生殖健康保障、生育负担适度、社会环境友好、发展充分均衡、生育自主选择五个方面入手。从人口学角度来讲,应对人口少子化的关键在于实现适度生育[20]。经济支持是最迫切的着力点。通过降低育儿成本、提供生育补贴和税收优惠,以减轻家庭的生育和养育负担。同时,构建高质量的托育服务体系,强化儿童照料支持,可有效缓解育龄群体的育儿压力。不仅有助于消除生育的经济壁垒,还能通过提升生育意愿,推动人口结构向均衡化方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育儿投入与养老权益的跨期转化机制,将家庭在育儿阶段的付出与未来养老保障相挂钩,形成生育养老的良性循环。二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破解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结构性矛盾。教育作为提升个体资本存量的主要途径,强调在平等竞争中促进阶层流动、提升社会地位,其公平性要远胜于其他手段[21]。需建立动态化的教育投入补偿机制。设立代际补偿教育基金,针对留守老人与流动儿童创设“隔代学习中心”,诸如浙江通过祖孙共学数字技能,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使老年照护能力与青少年发展需求形成闭环。既提升了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又促进了代际间的知识传递与情感交流。三要发展多元化养老模式,构建代际共生的生态循环。养老问题的关键是谁来提供养老资源,但“养老资源的提供者”和“养老职能的承担者”这两个角色是可以分离的[22]。目前,各地对于城市养老与农村养老模式都开展了有益探索,相关学术研究日益丰富,养老模式的创新在于打破传统角色藩篱,让代际资源在“需求-供给”的双向流动中形成共生闭环;通过智能匹配机制与弹性结算制度,将银发智慧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资本,构建“老有所为”与“少有所依”的动态平衡生态。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揭示：人口问题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镜像，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辩证运动的现实投射。当代中国人口发展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性意义在于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破解资本逻辑的困局。中国的人口治理创新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对超大规模人口现代化命题的原创性回答。

参考文献

- [1] [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M]. 人民出版社, 2004.
- [2] 朱巧玲, 王逸雯, 胡姜. 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挑战、机遇与实现路径 [J]. 江西社会科学, 2023, 43(8): 65-75.
- [3] 林进龙, 穆光宗. 人口哲学的出场: 人、人口与历史 [J]. 探索与争鸣, 2024(10): 39-50+177.
- [4] [德]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M]. 人民出版社, 2018.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M].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秦蒙.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J]. 理论月刊, 2023(9): 23-37.
- [8] 张川川.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特征与趋势 [J]. 国家治理, 2024(4): 16-21.
- [9] 国家统计局. 中国人口年度数据 [DB/OL]. (2024) [2025-04-19].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 [10]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Z].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 [11] 国家统计局. 分省年度数据 [DB/OL]. (2024) [2025-04-19].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 [12] 陈晓律. 现代社会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对英国社会福利及老龄化问题的思考 [J]. 经济社会史评论, 2025(1): 4-16+125.
- [13] 孙文亮, 原新.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中国新型发展战略——基于老龄化经济影响的视角 [J]. 河南社会科学, 2018, 26(4): 111-116.
- [14] 余靖雯, 郭凯明, 麦东仁. 中国隔代抚养文化、生育年龄选择与人口生育率 [J]. 金融研究, 2023(8): 189-206.
- [15] 日本厚生劳动省. 一般就业安置情况 [EB/OL]. (2025) [2025-05-10]. https://www.mhlw.go.jp/stf/newpage_57261.html.
- [16] 日本厚生劳动省. 2023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 [EB/OL]. (2023) [2025-05-10]. <https://www.nippon.com/cn/japan-data/h02059/>.
- [17] 张勇, 赵明霏. 产业升级与劳动者素质的匹配逻辑与协同路径 [J]. 理论月刊, 2021(4): 42-49.
- [18] 原新, 金牛. 新型人口红利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J]. 河北学刊, 2021, 41(6): 109-116.
- [19] 余永跃, 刘于兰.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实践路径 [J]. 人民论坛, 2023(16): 97-99.
- [20] 茆长宝, 穆光宗.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少子化 [J]. 人口学刊, 2018, 40(4): 19-30.
- [21] 张学敏, 周杰. 新时代教育突破社会阶层再生产问题研究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8(3): 146-156.
- [22] 穆光宗. 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5): 39-44.